

“两高”重提“呼格案”，认错才能纠错

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需要变革的，恰恰是那些存在问题的领域或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发现问题、承认问题、直面问题，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更有效率。



本报评论员 姜士强

昨天上午发布的“两高”工作报告，都提到了呼格吉勒图案。这起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件，反映出司法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呼格案”写入“两高”报告，客观上体现了直面问题的态度。

在今年的两会上，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直言“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张德江则在人大会议

上提到“教训十分深刻，必须引以为戒”的衡阳贿选案。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在两会这个最高政治平台之上，代表委员的问题意识，更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

与问题相对的是成绩，成绩不是不可以谈，但要适度。成绩谈得过多，比例过重，很容易就把问题掩盖起来，甚至让人不思进取。近期不少电视台都在播放《平凡的世界》，剧里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就提到，越是贫困落后地区，那里的领导脑筋也更僵化，说的就是那些不愿面对问题，还满口“形势大好”的人。如此一来，结果必然是积重难返。

特别是现在，中国正处于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需要变革的，恰恰是那些存在问题的领域或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发现问题、承认问题、直面问题，改革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更有效率。几天前，王岐山在听取代表关于农垦改革的发言时，就忍不住插话说“还是要少说点成绩，多谈点问题和建设”。中央领导都急着要听问题，足以反映改革任务的紧迫性，只不过就像那位被打断的发言者，有些人没能跟上节奏，没能走出“强调成绩”的思维惯性。

当然，仅仅有问题意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直面那些改革中的真问题。今年2月份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说到中国目前的改革，“好吃的肉都吃掉

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需要解决的当然不是不痛不痒的小问题，而是关乎体制机制的大问题。就像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提到的具体案件不止一个，“呼格案”写入报告备受关注，就是因为它关系到检察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体制性问题。至于人大工作报告中的“衡阳贿选案”，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两会上谈谈成绩，表表功劳，确有鼓舞人心和士气的的作用，但是用更多的时间谈问题、找不足，在当下或许更能让人“深受鼓舞”。只有真正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推进。

QILU EVENING NEWS 齐鲁晚报 www.qi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 (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 (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 (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 (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ilwb



齐鲁晚报微信 qilwanbao002



读者服务中心 96706 www.qilwb.com

大家谈

制度设计合理，“延退”或成自觉

□房连泉

延迟退休是今年两会上的一个热点，赞同的、反对的声音都有。其实在世界各国的社保改革中，这也是一个敏感话题。就个人而言，“退休”指的是个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这种自主决策受个人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储蓄水平和福利偏好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联系在一起，通常是指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而法定退休年龄通常又分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和提前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两类规定。在欧美大部分国家，要获得全额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门槛通常为35至45年，提前退休一般不得超过5年。在两个年龄线之间，工人可自主选择，即所谓的弹性退休。就实际退休年龄统计看，通常与法定退休年龄有一定偏差，在不同国家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韩国，2012年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而社会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则高达71.1岁(男性)；在卢森堡，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而社会平均实际退休年龄仅为57.6岁(男性)。

自上世纪末以来，延迟退休金领取年龄成为各国社保改革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分析，目前其34国的平均法定退休年龄约为64岁，在未来50年内，各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将上升7岁之多。为此，目前有28

个OECD国家已制定或正在制定“延退”计划，其中一个新的趋势是：2020年之后67岁将替代65岁成为退休年龄的“新常态”。

作为一项社保改革的公共政策，“延退”政策的顺利推行与养老金制度的整体设计联系在一起，为鼓励延迟退休，各国主要采取如下几类做法：

一是建立强制性养老金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为自我储蓄式的养老金计划，职工在年轻时储蓄，退休时从账户“提钱”养老。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缴费的计息方式：一是积累制投资账户(例如在智利)，积累起的养老金通过投资资本市场获得收益；二是记账式账户(例如在瑞典)，即国家赋予职工个人缴费一个记账利率，该利率水平通常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挂钩，保障个人账户养老金在退休兑现时不贬值。

二是部分国家引入“积分制”的养老金待遇确定方式。职工缴费相当于“挣工分”，缴的钱换算成积分，记在个人头上，退休时按积分“分值”发放退休金。这种方式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得到应用。

三是在养老金待遇计发公式中引入奖励因素。一般来说，提前领取退休金会面临“处罚”，晚领则给予“奖励”。例如在美国，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为67岁，职工最早可在62岁时领钱，但待遇额要消减25%，并且这种缩水是终身的，

目的是抵扣个人“少缴多领”的年份；而个人在超过67岁之后继续参保缴费时，退休金每年则可获得8个百分点的奖励，延续缴费可维持到70岁。在法国，提前退休的养老金罚点为每年5%，65岁后延退，每年奖励10%。

四是政府采取缴费补贴政策，鼓励老年人长缴。由于收入水平低、发生失业、缴费断档等原因，部分接近退休的老年人面临着养老金储蓄不足的情况，一些国家采取了对其缴费给予补贴的做法，个人退休越晚获得的匹配额越多，从而起到引导延迟退休的作用。

五是加大信息的宣传与透明度。“延退”政策是向社会发布的一个公共信号，需要有一个适应期，以使公众的就业预期做出调整。在此过程中，养老金政策的理解和宣传普及非常重要。例如，瑞典的社保局每年定期向参保人发送“橙色信封”，其中的信息包括对个人在61岁、65岁和70岁退休时的待遇额测算，并在网上提供养老金待遇的计算工具，目的在于让年轻人轻松比较在不同退休年龄段可获取的待遇水平，从而做出适合个人的选择。

归纳起来，各国“延退”政策的强制实施并不是孤立而行的。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前提，激励机制的引入是关键，政策的引导和信息宣传则是重要保障。(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

试说新语

当姚明越来越像政治家

□崔滨

今年全国两会，是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三年。虽然他依然只能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单设”的过道里聆听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声音，但这并不妨碍他越来越纯熟地融入代表公众参政议政的政治语境，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家”，而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些角色转变，也反映出“明星”这个群体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变化。

继去年的“赛事审批改革”提案得到总理表扬，并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姚委员带上全国两会的推广“专项体育课”的建言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同时，姚委员还被专门选中，出席全国政协记者会，代表2200余名全国政协委员与媒体分享议政心得，其“参政”水平称得上是突飞猛进，曾经体育界的“中国高度”，如今赫然是两会上的“明星高度”。

每年全国两会，参会的文艺、体育明星，永远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明星”们所从事工作与政治相隔甚远，而且距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诉求也相对较远，这往往使得明星代表、委员们所提出的建言提案不那么尽如人意。幸好，姚明在全国两会上状态的渐入佳境，为“明星”们到底能否合格地参政议政，做了最好的正名。就像姚明自己说的：“明星委员是客观存在的，包括自己在内。”但如何去看待明星委员，则是公众和明星双方，都需要慎重考虑的。

一方面，明星委员应该珍视自己参政议政的机会，在全国两会的重要场合上做出有质量的提案，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觉做好从“公众明星”到“政治明星”的转变；同时，公众也应该帮助明星们做好这一转变，至少做到姚明所提醒的，不要把追星的不理智行为，也带到全国两会这样严肃的场合。

作为中国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之一，随着中国参政议政的舞台对社会更多阶层的包容和吸纳，体育、演艺明星更多地走上前台，为更多元的社会群体争取利益，这本身就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

而且，自带影响力光环的明星们对政治议题发声，更容易引发社会关注和群体共鸣，这是明星委员们独有的优势，如果善加利用，明星委员更有机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也许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明星代表、委员还将会是全国两会上的焦点和舆论焦点，但至少从今年的姚明开始，明星们的参政议政有“政治家”的样子了。

本版投稿邮箱: qilulingun@sina.com

舆论场

女权与Logo

就在两会与世界妇女大会相遇北京的同时，一场似乎积蓄已久的论战上演了。知名搜索引擎百度和视频网站优酷为庆祝妇女节换上的两个logo，成了最终的引爆点。

多人批评歧视女性：3月，一份“将妇女的产假逐步延长，甚至可以延至3年”的政协提案，又引发了围绕“女性到底该比男性享受多少特殊待遇”这一老话题的新争论。

可以说，女权主义者与其反对者们，在这接踵而至的风波中，都在剑拔弩张地等待着一个火星点燃新的战斗。在这个节骨眼上，百

□王昱

八音盒里的跳舞女孩和坐在扶手椅里喝茶的姑娘，这是百度和优酷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方式。令人意外的是，这两个logo却被很多人视作性别歧视的典范。

有批判，自然也少不了批判之批判。比较有代表性的应战文章，是中新网刊登的一篇题为《女汉子还是女神》的文章，“其实冷静地看待两家的妇女节logo，不过是表现的女性的两面，一面是对外的独立坚强，一面对内温柔的公主梦，完全谈不上谁尊重，谁不尊重。如果说像公主一样呵护自己的妻子、女儿就成了反女性主义，就成了不尊重女性，那试问有多少姑娘在坚强的外表下不愿意自己被呵护地像一个公主。”

区区两个logo竟能引发一场骂战，其深层原因是自今年开年以来几场舆论风波已经为这场争论积累了足够的舆论势能：今年1月，作家周国平在微博上因为一段：“男人有一千个野心……女人只有一个野心……”的表述引发了女权主义者的激烈批判；2月，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小品《女神和女汉子》，被很

度和优酷非常不幸地撞上了枪口。

不过，在捋清了这场论战的源流和双方阵营的成色之后，有一个细节会让旁观者觉得有些困惑，因为有关妇女权益的争论其实是一场乱战——女权主义者刚刚支持“妇女产假延至3年”的提案，转而又需要去反对“你值得呵护”的文案。看来，对于“女性到底该不该以‘呵护’为名受到特殊对待”这个基本问题，参与中国女权主义论战的绝大多数人，往往还没搞清楚，就忙不迭地上了战场。

就在logo之争即将偃旗息鼓的时刻，后知后觉的共识网在11日刊登了题为《两个logo引发的一场伪女权主义的批斗》的文章，文章认为：“女权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内核往往被国人忽视了，那就是人权的平等……男女双方应该把对方当作一个人来尊重。”

眼下的中国女权主义似乎还只是个logo，也许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真正弄清楚维护女权到底该主张些什么。对于混战中的当事人来说，与其费口舌相互攻击，不如像全国人大代表李欣然那样，面对记者的提问，自信地说一声“我就是‘女汉子’”。